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5007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特征及英译融通

张格兰

(湖南工业大学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外交的话语自信和文化自觉明显增强, 传统文化理念引领、支撑、形塑中国特色外交实践的核心与指南地位凸显。具体来看,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蕴含“和合”文化内涵, 体现“中庸”交往原则, 强调“变易”思维方式, 彰显“神韵”审美理想。为实现中外融通, 译者需把握政治高度、揣摩文化内涵、再现源语口吻、灵活转换思维、巧用英译技能以及重视读者意识, 打造中国话语与国外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空间, 将“阻抗性”和“对话性”之间的角力转化为相对和谐的共处, 呈现出外交译语独特的张力与魅力。

关键词: 传统文化理念;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 英译融通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5-0054-07

Features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Effective English Translation

ZHANG Gelan

(Colleg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has been characterized with a significant demonstration of enhanced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keen cultural self-awareness. The core role to be played by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has become prominent in guiding, sustaining, and shaping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China's distinctive diplomatic discourse embraces the connotation of "unified harmony" in traditional culture, embodie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golden moderation" in communication, emphasizes the thinking mode of "adaptable change", and highlights the aesthetic ideal of "romantic charm". In order to achieve an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s, translators need to sharpen the political sensitivity, ponder cultural connotations, render the ton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distinguish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modes, skillfully adopt English translation skills, thus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interactive platform for Chinese discourse and foreign audiences, converting the struggle between "rivalry" and "dialogue" into a relativel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presenting the unique flexibility and vivacity of diplomatic translated languag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oncepts; diplomat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ffective English translation

收稿日期: 2025-04-3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汉英传译中的语义韵研究”(23YBA164);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外交话语英译体系构建研究”(23B0578)

作者简介: 张格兰, 女, 湖南益阳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大国话语权较量层出不穷。在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中，如何有力消解对华偏见论调，营造更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课题。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多重挑战，如何从文明对话与文化自信中汲取智慧，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也迫切需要在文化层面深入思考。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传统文化始终是其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全面性、和谐共生性、自主创新性、包容互补性的内涵，奠定了中国外交思想的总体基调，孕育出中国外交风格的独特魅力，并对中国国际形象起到柔性塑造的作用。

目前，国内学界主要从政治学、外交学及语言学的视域考察外交话语特征，内容涵盖中国外交宏观架构、能力建设以及言语行为特征等方面^[1-2]。在宏观架构方面，学者从外交理念出发，认为外交话语具有互联互通的属性^[3]，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在能力建设方面，学界致力于从学理层面阐释外交思想，从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体系化等维度，推动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展^[4]，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撑。在言语行为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修辞原理、生成机制和总体风格^[5-6]，展现出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国外外交话语研究以中国学者为主，内容聚焦于外交话语语言特征、语用现象以及翻译策略上^[7-8]。研究趋势上，国外相关研究向“政治话语”功能倾斜，突出话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中西差异^[9-10]。综合来看，国内外外交话语研究已取得可喜成绩，但以文化本位为视角的研究存在滞后性。本文尝试从传统文化出发，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的讲话为研究对象，挖掘外交话语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并提出外交话语英译融通的六个维度，以期为促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深化、推动中国外交话语英译体系的构建、助力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 and 认同中国道路提供思考与借鉴。

一、传统文化理念下中国外交话语的典型特征

文化理念不仅构成了一国人民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而且为一国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其存在不仅对当今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引、支撑和形塑了中国外交话语的典型特色。受这种文化理念的影响，中国外交话语表述体现了“和合”内涵、“中庸”原则、“变易”思想、“神韵”美感等传统文化基因。

（一）“和合”：中国外交话语的文化内涵

关于“和合”的记载最早见于《国语》，即“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而后经诸子百家等多种文化流派彼此渗透、推衍和融合，最终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精神质素，成为独具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范畴。中国传统“和合”思想认为，万事万物是多元共生、相互联系的，它统摄着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合”思想为当代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处理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源泉^[11]。

“和合”思想早已沉积和浸润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内涵上，中国外交以“和合”为价值核心，彰显“和合”思想一脉相承的外交立场，具有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整体性、传承性、包容性、伸张性和全面性。不管是“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还是“和而不同”的交往文明，抑或是“协和万邦”的外交智慧，都充分体现了“和合”观，也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原则和方向。方式上，中国外交中的“和合”精神主要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国家治理的和谐、国与国的和谐以及内心的和谐得以呈现。在习近平外交话语中，有很多关于“和合”思想的论述，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和谐；“国际社会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人民之心为心”，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和谐。这些外交话语反映了“和合”文化精神下所蕴含的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价值内涵。“和合”价值观是基于中国文化、实践和逻辑所形成的，是历史与现实的交互体现。

（二）“中庸”：中国外交话语的交往原则

作为儒家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中庸”强调人的和谐平衡，推崇适度的生活方式，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礼记·中庸》

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即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平衡态势。“位育”是指万物在天地间找到自身的位置，各得其所，从而带动整体发展。可见，“中和”是实现“位育”的方式。“中和位育”的哲学观秉持“中道”，恪守“正道”，提倡通过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宽容和体谅来实现和平。此外，“中庸”观念体现在不受制于二元对立，不囿于简单因果的哲学束缚，关注复杂的系统思维，强调事物之间可以相互依赖和转化。

正是强调守“中道”、致“中和”、行“中庸”，中国外交体现出鲜明的尚“中”特色^[12]。思想上，中国外交强调各国需相互尊重，建立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主张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和实现路径；政治上，中国外交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战略布局，在坚持不结盟的基础上努力扩大中国的“朋友圈”，比如“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朋友多了，路才好走”^[13]；经济上，中国外交以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平台，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五通”建设，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这些举措“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14]；交往上，中国外交主张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原则，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努力做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4]。这些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与交流互鉴原则正是中庸思维的真实写照。

（三）“变易”：中国外交话语的思维方式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变易”思维在先秦时期就得到了深入阐释，如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孔子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庄子的“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等。这些观点的共性在于揭示了世间万物处于变动不息、永不停歇之中。儒家经典《周易》将“变易”刻画得淋漓尽致：“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里的“易”有三层含义：一是事物之间存在关联协作性，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阴阳五行说；二是在一定条件

下，事物之间的矛盾可以相互转化；三是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包含创新的成分，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显然，“变易”思维主张因时而变、与时偕行、生生日新。

当前，习近平外交话语对于世界格局和形势的研判，对于全球治理所提出的方案，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变易”思维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在全球治理格局上，习近平认为世界朝多极格局发展，并指出“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难逆”；在全球治理规则上，习近平提出零和博弈思维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将古语“随世而制”巧妙化用为“随事而制”；在区域发展关系上，习近平主张各地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应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此外，习近平外交话语的“变易”观还强调“时”的意蕴，如“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以说，习近平外交话语中的“变易”思维兼具“变”和“时”，具有时代性、融合性和创新性。这些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崇尚“变易”的智慧，改变了外交话语以往官方刻板、高不可攀的印象。

（四）“神韵”：中国外交话语的审美理想

“韵”与“气”的范畴相关，前者最早用于声乐领域，而后作为最高审美标准推广至其他艺术领域，后者囊括了艺术家身上整体呈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历史上，曹丕注重对“气”的研究，谢赫标举“气韵生动”说，宋轍强调“为文必养气”，这些都从精神层面对文艺提出了要求^[15]，传递了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在《古画品录》中，谢赫首次将“神”与“韵”两字连用，以“神韵气力，不逮前贤”品评顾骏之。唐代的张彦远、宋代的黄庭坚、明代的胡应麟等多次使用“神韵”“气韵”术语。《中国文论大辞典》对“神韵”定义为：“写景、叙事、抒情留有余地，事外有远致，阴柔而含蓄，令人玩味，具有清雅淡远的意境”^[16]。风格上，“神韵”具有整体性、经验性、稳定性和模糊性；内容上，“神韵”体现在辩证统一、天人合一以及仁爱守礼等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的内核、多元的脉络、包容的精神，而这些为“神韵”的审美理想提供了丰润的土壤与养分。尽管中国外交话语属于官

方话语，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但“神韵”的美学取向同样体现在其表述当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习近平表示：“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我看现在需要‘全球共济’”；在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时，习近平表示：“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习近平感言：“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可见，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对受众的亲力和感召力^[6]，语言上呈现整齐匀称、深刻通透、意蕴丰富、质朴易懂等特点。

二、“阻抗性”和“对话性”的共场：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英译融通

习近平外交话语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文本极大的开放性^[17]。在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因涉及异质成分处理，有时会出现剧烈冲突，译文对读者形成某种方式的拒阻，可称作“阻抗性”。交际双方以符号为媒介，通过对话求得相互理解，其指向翻译本质的过程，可视为“对话性”。中国特色外交话语英译既要保持中国特色，又要注重中外融通。保持中国特色，可视为翻译“阻抗性”特质，这是由中国外交话语本质与中国特有文化制度所决定的；注重中外融通，可看作翻译“对话性”特质，这是翻译的跨文化属性所致。事实上，“阻抗性”和“对话性”的翻译角力时刻存在于文本之中：一方面，译者需精准传递原文的政治内涵和寓意，再现原文口吻和神韵，传播地道的中国文化元素；另一方面，译者需转换中西思维，巧用翻译技能，使读者得到全方位观照。在中国特色外交话语英译过程中，“阻抗性”和“对话性”是共场的，二者在传递中国异质元素的同时，保证了读者获得清晰流畅的阅读感受，实现了汉英翻译的融通和中西文化的良性互动。

（一）把握政治高度

作为外交话语的首要特征，政治性是外交话语英译中必须严格遵守的一条红线。在英译过程中，译者需精准把握源语政治内涵，注意传达原

文情感色彩，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等效”。政治内涵和情感色彩主要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与“神韵”决定的。这就要求译者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并做到以下三点：译前应对外交翻译活动本身意义、目的有整体意识，遵循正确的政治导向，不能左右摇摆、模棱两可；译中应对外交翻译中的措辞加以推敲，注意把握政治内涵和话语分寸；译后应对外交话语译文仔细推敲、反复打磨，尤其在英译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等原则性问题上，要特别注意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概言之，“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18]。如例1：

原文：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的讲话）

译文：We have patience and will strive for the prospect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utmost sincerity and efforts. That said, should the separatist forces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provoke us, force our hands or even cross the red line, we will be compelled to take resolute measures.

王弄笙认为，翻译这类权威语篇要有政治高度，所生成的译文既要扣得紧，又不能太死；既要灵活，又不能活得出格^[19]。外交话语具有鲜明政策性和政治敏感性，它要求英译时应结合上下文语境和时代大语境，识别并准确传递原文的政治意图和话语内涵，保证原文信息和寓意的准确传达。上述译例遵循了政治性第一的翻译原则，较好地把握了语言分寸：在句式方面，译文首先将原文的一句拆分为两句，强调中方崇尚“和合”，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其次，译文将“should”提前构成倒装句，表示语气较强的某种假设。在表述方面，“挑衅逼迫”被套译为“force our hands”，“不得不”被直译为“be compelled to”，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原文政治内涵。通过分译、套译、直译，译者保留了中国元素的原汁原味，彰显了外交翻译的“阻抗性”。

（二）揣摩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不仅是推进中国发展的内部动因，而且构成中国深厚的软实力。中国外交话语蕴含大

量具有中国元素的词句表达和修辞方式,体现了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价值意蕴,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内涵和“中庸”价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仔细揣摩深刻的文化内涵,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在理解层面,译者应深入探究中华文化实质,解读其中的核心理念;在表达层面,译者需适当解释文化要素,包括诗词典故、成语谚语、习语俗语等。因为这些元素不仅能丰富语言形式、增强话语张力,而且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例2:

原文: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习近平2024年5月5日在法国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

译文:Confucius observed that “a man of true moral integrity is one who is both friendly but independent, and who does not compromise his principles, and who is independent without any bias or taking sides”.

原文出自《中庸·第十章》,含义是“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通过引用此语,作者暗示治国之道如同君子做人,强调中国外交守“中道”、致“中和”、行“中庸”,敢于为社会的道德和公正发声。针对文言词“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强哉矫”,译者采用“以句释词”进行释译。若作回译,划线处可译为“君子友好且尚‘中’,他坚守原则、坚持中道、不偏不倚”。此外,译者增加了“that”“who”“but”等连词和介词,使译文在形式上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可见,依据外交语境进行释译和增译,不仅完满传递了原文内涵,还能增进受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外交翻译“对话性”的实现。

(三)再现源语口吻

口吻是说话者在表达观点或态度时所流露的情感色彩,主要通过措辞体现,属于翻译理论中的“美学”范畴^[20],准确识别原文口吻能让译文“锦上添花”。这主要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神韵”美学风格和“变易”思维。对于外交翻译而言,口吻真实存在却难以捕捉,它是衡量外交翻译质量的重要参照^[21]。正因为外交口吻的隐蔽性,译者需要结合宏观政治语境展开分析,并从微观语篇中认真感悟,方能准确辨识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再现源语口吻,对于精准揭示外交意图、

实现译文“意”“味”双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例3:

原文: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存在由某个国家说了算的国际秩序。(习近平2023年3月20日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

译文:No country is superior to others, no model of governance is universal, and no single country should dictat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例3中,原文以一系列蕴含哲理的话语即“高人一等”“放之四海而皆准”“说了算”,形象说明了各国都有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权利,语体正式严谨又平易近人。在翻译中,外交语体口吻与“神韵”美学理想密切相关,它要求译者对原文多加推敲。通过对政治语境和上下文语篇的仔细体悟,译者辨识了隐藏于话语背后的“弦外之音”:一是运用消极语义韵如“superior”“dictate”,再现中方斥责他方企图操控国际秩序的严厉口吻;二是运用“No country”“no model”“no single country”措辞,表达言说者明确而坚定的立场和态度,准确传递了原文的政治意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外交翻译的“阻抗性”。

(四)灵活转换思维

外交叙事是在外交语境下采取故事化、情节性的话语方式,旨在获得国际受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的一门科学^[22]。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叙事主题复杂化、视角多样化、方式灵活化。外交叙事在主题上实现了宏大叙事和微末叙事的突破,视角上依叙事类型而定,体现译者的身份介入和移情程度,方式上灵活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其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庸”价值和“变易”思维。在外交翻译过程中,叙事模式的改变离不开外交话语复杂性和敏感性等自身因素的影响,但创新叙事模式的关键还是中西思维的转换。如例4:

原文: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译文:The pioneers of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won their place in history not as conquerors with warships,

guns, horses or swords. Rather, they are remembered as friendly emissaries leading camel caravans and sailing ships loaded with goods.

思维方式是沟通语言与文化的桥梁。在英译外交话语时，译者需将以悟性思维为主导的汉语转换为崇尚理性思维的英语。例4中，译者首先打破了原文句法框架，将原文分句译为两个独立句。其次，译者将“The pioneers of the ancient silk routes”作为第一个主语，明晰了原文主题。再次，译者合并同类项，将原文“战马”“长矛”“坚船”“利炮”放在一起，舍弃语法冗余项。最后，译者将汉语主静、多被动语态的句式转换为英语主动、多被动语态的句式，如译文中的“leading”“sailing”“be remembered as”等。总之，通过运用情节化的语言，译者创新了原有的叙事模式，实现了外交翻译的深层对话。

（五）巧用英译技能

在技术赋能时代，译者不仅面临读者意识和本位意识的矛盾，而且面临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博弈，这些矛盾共存状态下译者选择对话的立场构成外交场域中翻译“对话性”的前提。面对外交翻译，译者要站稳政治立场，做到灵活变通，确保外交话语内涵得到精准传递。具体而言，具有复合身份的外交译者可充分利用文化端口优势，对不同的外交文体、结构、意义进行变通，使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传播更具影响力和亲和力。由此可见，巧用英译技能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变易”观。如例5：

原文：我认为，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习近平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译文：I believe that if we ar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of a generation, we must, as we say in Chinese, not allow our vision to be blocked clouds, but dispel the clouds so we may see the sun. In other words, we must grasp the objective laws of history and the underlying trends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例5中，译者综合运用多种英译手段，兼顾了概念准确性和受众接受度，提升了译文的对话性和可达性。首先，通过厚植语义，译者增补了

诸如“if we are”“as we say in Chinese”等有效信息，帮助英译读者更准确地理解译文。同时，译者适时切换叙述视点，将原文“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换译成“not allow our vision to be blocked clouds”，使译文在语义和语法上都符合西方受众的阅读习惯。此外，译者充分发挥灵感思维，对原文采用改写、重构的创译手段，将“把握时代规律，认清世界大势”译为“In other words, we must grasp the objective laws of history and the underlying trends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六）重视读者意识

在翻译活动中，翻译传播效果取决于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因此读者意识是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的因素。从定义上看，读者意识是指译者在外交话语英译过程中，关注和了解译入语读者，并将其认识用于指导自身翻译实践^[23]。从作用上说，读者意识是译者采取翻译策略的重要依据，也是译者实现翻译目的和价值的关键要素。在外交翻译中，译文只有被读者理解和接受，中国外交话语英译实践才有了对话的意义和价值。在黄友义提出的“外宣三原则”中，“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便是译者观照读者意识的表现^[24]。重视读者意识主要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内涵和“中庸”价值。如例6：

原文：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习近平2022年1月17日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译文：Though counter currents are sure to exist in a river, none could stop it from flowing to the sea. Driving forces bolster the river's momentum, and resistance may yet enhance its flow.

原文中“大江”“逆流”等意象生动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这些意象对中国读者来说十分熟悉，但对于西方受众而言，却是相对陌生的事物。对此，译者在译文中运用“river”“counter currents”，保证了信息的传递。同时，译者使用一系列情态词“be sure to”“could”“may”，再现了领导人对未来前景的乐观态度。此外，译文还增加连词“Though”“and”“yet”，显化了“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这一主题特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译者的读者意识，也更有利于激发受众

的情感共鸣。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命脉,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和合”“中庸”“变易”“神韵”分别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思维特征以及美学基因,其中蕴含的中国义理和智慧,对支撑和形塑中国特色外交实践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当然,从传统文化角度研究中国外交话语并非强调文化的独占性和唯一性,也并非意味着将中国传统与现代世界对立起来。建构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既要强调中国元素的传播,又要学会与世界融会贯通。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英译融通必须通过语言转换环节才能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承担着将这种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话语转化为感召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任:既要把握原文政治文化内涵、精准传译外交口吻,又要灵活转换思维、广泛使用翻译策略、重视读者意识。在英译中国外交话语时,需要更多理解、沟通和对话,也需要更多的优秀译者将中国外交话语中异质的文化内涵、构建原则、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传递出去,在保证流畅的阅读感受的同时,有意地保留富含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让世界文明百花齐放、生机盎然。

参考文献:

- [1] 刘建飞.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基本框架论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2): 4-20, 155-156.
- [2] 凌胜利. 中国外交能力建设: 内涵与路径[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2): 20-36, 153-154.
- [3] 王义桅.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外交理念的时代演进[J]. 红旗文稿, 2024(13): 45-48, 1.
- [4] 王帆.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战略观解读[J]. 国际观察, 2024(6): 1-24.
- [5] 赵玉倩, 杨明星. 外交隐喻的特殊属性与修辞原理[J]. 当代修辞学, 2022(3): 54-66.
- [6] 钟含春, 范武邱. 习近平外交话语风格特点及传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18(3): 46-51.
- [7] ZHANG J F. From Interpersonal to International: Two Types of Translation in the Making of Implicitness in Diplomatic Discourse[J]. Perspectives, 2014, 22(1): 75-95.
- [8] YANG M X. The Principles and Tactics on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J]. Babel, 2012, 58(1): 1-18.
- [9] SMITH S N. Harmonizing the Periphery: China's Neighborhoo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J]. The Pacific Review, 2021, 34(1): 56-84.
- [10] AFZAAL M, ZHANG C X, CHISHTI M I. Comrades or Contenders: A Corpus-Based Study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 US Diplomatic Discourse[J].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2022, 7(3): 684-702.
- [11] 马倩. 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12] 潘忠岐. 中国之“中”与中国外交的尚“中”特色[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2): 117-130.
- [13] 习近平. 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EB/OL]. [2025-04-22]. https://www.gov.cn/xinwen/2014-11/09/content_2776634.htm.
- [14] 习近平. 开辟合作新起点 谋求发展新动力: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EB/OL]. [2025-04-22]. 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jzg_673183/gjjjs_674249/gjzyhygk_674253/ydyfjh_692140/zyjh_692150/201705/t20170515_10410177.shtml.
- [15] 王海铝. 意境的现代阐释[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5.
- [16] 彭会资. 中国文论大辞典[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0: 458.
- [17] 刘世浩.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5): 94-101.
- [18] 程镇球. 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 中国翻译, 2003, 24(3): 18-22.
- [19] 王弄笙. 近年来汉英翻译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J]. 中国翻译, 2002, 23(1): 22-28.
- [20] 毛荣贵. 翻译最难是口吻[J]. 中国翻译, 2002, 23(2): 29-30.
- [21] 范武邱, 信萧萧. 外交翻译中的口吻传译[J]. 上海翻译, 2017(6): 16-20, 42.
- [22] 杨明星, 潘柳叶.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外交叙事模式[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3): 55-61.
- [23] 卢小军.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 [24] 黄友义.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 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 中国翻译, 2004, 25(6): 27-28.

责任编辑: 徐海燕